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inan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0-5072,CN 44-1285/C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后殖民认知偏见与港人国家认同建构
作者：杨晗旭，常乐
网络首发日期：2022-05-27
引用格式：杨晗旭，常乐. 后殖民认知偏见与港人国家认同建构[J/OL].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285.c.20220526.1139.008.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后殖民认知偏见与港人国家认同建构

杨哈旭，常 乐

【摘 要】心理结构对社会集体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在香港建立了基于偏见认知的社会心理结构。香港回归后，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及反对派的长期错误引导，香港在文化教育层面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相疏离，港人对内地的了解和融入存在诸多障碍。从后殖民主义和社会心理学视域来看，香港社会需要制定相应的教育、文化和民生保障方案，在集体心理认知层面打破以文化偏见、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身份认同偏见为主要要素的“后殖民”心理症候结构。

【关键词】“一国两制”；香港；国家认同；偏见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2)05-0001-09

DOI:10.11778/j.jnxb.20212839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提升港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提供了稳健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但提升国家认同感是一个系统工程，香港各界不仅需要在经济与民生层面夯实增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在集体心理认知层面，消除部分港人对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本文尝试从心理认知层面剖析港人国家认同缺失的深层肌理，提出消除各方面偏见与歧视的可能路径。

一、香港“后殖民”心理结构的要素与特征

“后殖民”心理结构是殖民者对被殖民国家或地区所带来的诸多形式的社会偏见以及支撑该偏见长期延续甚至强化的社会心理体系，其对社会集体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首先，“后殖民”心理结构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不仅影响前殖民地的社会表层架构，而且影响前殖民地人民的情感、信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弗兰斯·法农(Franz Fanon)、让-保罗·萨

作者简介：杨哈旭，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常乐，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一国两制’理论与澳门成功实践研究”(19BKS039)；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德育专项)“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及有效机制研究”(2020JYDY045)；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深港青年中国历史教育平台建构研究”(zdfz20001)。

特(Jean-Paul Sartre)、阿尔贝·梅米(Alert Memmi)等思想家曾对“殖民心理状况”做过深刻批判。在他们看来,殖民化对殖民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层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以某些孤立的现象、标志或者符号来体现,而是作为一系列情感和信念结构被固定下来。在梅米看来,“对种族主义正式论点的驳斥是完全不够的;人们必须剥离它的情感和信念的基本体系,这些体系构成其话语并支配其行为。”^①萨特也明确提出“殖民主义是一个体系”^②,“当我们谈到‘殖民体系’时,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意思。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这个系统一直存在,并在起作用。殖民主义的丑恶循环毕竟是现实的。但这一现实体现在一百万殖民者、殖民者的子女和孙辈身上,他们被殖民主义所塑造,并根据殖民制度的原则来思考、说话和行动。”^③总之,在梅米和萨特看来,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不仅在殖民时期产生影响,在后殖民时期,其作为体系还会被继承并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其次,“后殖民”心理结构具有对外群存有偏见、歧视或刻板印象的集体心理特质。根据社会心理学现实冲突理论,随着竞争的加剧,竞争群体之间会产生偏见、歧视和仇恨。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歧视和偏见的唯一因素,人们将人群划分为“我们对他们”的心态也是社会偏见心理的重要诱因。群体成员之间往往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形成排他性组织,不愿意让外人加入本群体。刻板印象则是对社会群体成员的各种特质、态度或行为有共同信念,即“他们通常都是相似”的假定。^④在殖民时期,殖民者往往带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看待被殖民者。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这种偏见、歧视或刻板印象仍然得以留存,被殖民者群体之间相互歧视。

“后殖民”心理结构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被建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随之瓦解。尽管如此,前殖民地的“后殖民”心理结构仍然被延续下来,以种族矛盾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等方式存留下来。在此之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哪怕处于冷战边缘的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存在。^⑤第二阶段,在冷战结束后,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束,全球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出现低烈度的态势,后殖民心理状况也相应不再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第三阶段,在当代,全球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不断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工具对非西方社会施压,殖民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所留下的“殖民心理结构”在曾被西方殖民者蹂躏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逐步凸显。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观念上仍然受到西方的制约,甚至产生激烈的社会变革和矛盾冲突(比如进入21世纪,在东欧国家、西亚北非出现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在此阶段,后殖民心理结构主要影响相应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国家主权安全。

后殖民心理结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文化/历史——民族/种族偏见,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偏见和群体身份认知偏见。

首先是文化/历史——民族/种族偏见。西方殖民者不仅掠夺一个社会的财富与自由,还剥夺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使人民在智力发展和道德方面均迷失方向。殖民者通过意识形态,向非西

① Memmi, Albert, *Rac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22.

② Sartre, Jean-Paul,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9.

③ Sartre, Jean-Paul,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7.

④ [美]塞缪尔·伍德、[美]艾伦·格林·伍德、[美]丹尼斯·博伊德著,赵晴译:《心理学的世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6—458页。

⑤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孙霞、胡勇、郑力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2页。

方世界不断灌输西方世界在种族和文化上优于非西方世界的观念。在《地球的悲惨》(1961年)中,法农分析了殖民主义通过何种文化策略系统地否定被征服人民的“人类”属性。根据他的考察,一些殖民者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非西方世界族群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遭遇的不利处境,源于他们的遗传缺陷或是道德文化缺陷。同时,将自身的殖民史视为“文明的延伸”,而将殖民地遭受殖民前的历史写成“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历史,以塑造殖民主义的合法性以及西方文明至高无上地位。^①

其次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偏见。在文化社会心理偏见的基础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偏见被建构出来。在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和民族优势论开始演变为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信仰体系 and 政治制度优势论。“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遏制和平演变战略,对非西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意识形态渗透策略。西方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渗透一直深刻影响世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西方国家习惯性以“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来强调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以稳固其对非西方国家上层建筑的支配地位。

最后是群体身份认知偏见。该偏见集合了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内容,形成想象中的本土群体的“优越感”以及对群外“他者”的敌视心理。在身份偏见心理架构下,社会被视为一个剧场或舞台,不同的人群与生俱来就扮演着某种角色。法农所谈到的殖民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殖民者将当地人分成不同组别的人群。比如,1935年,比利时为统治需要,在卢旺达确立新身份证制度——按财产多寡将卢旺达人的身份划分为胡图族和图西族。图西族拥有各种特权,子女接受精英教育,学习如何管理国家,而胡图族则被定义为天生的低等种族,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在法律框架中只能作为国家的劳动力而存在。这意味着,阶层之间的差别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比利时引入的身份制度改革后果是直接导致卢旺达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胡图族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阶层的界限。这导致了社会底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最终引发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在反全球化思潮泛滥的当代,群体身份偏见更加凸显,比如“白人至上”的社会心理认知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甚嚣尘上。

二、香港“后殖民”认同心理体系的形成与变迁

香港殖民偏见心理结构是在英国统治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自开埠以来,港英当局首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塑造英国人对中国人“文明引导者”角色。在政治层面,港英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华人始终不信任。行政机关只雇佣外国人,排斥华人;在经济层面,从事对华贸易的欧美人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掌控香港,以统治者的面貌出现。凭借政治优势,外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诸如英资集团汇丰、渣打、怡和、太古,逐步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在社会生活层面,实行若干种族歧视政策。比如,1871年开放的香港动物植物园只对欧洲人开放,提供西方居民散步或夏日音乐节的休闲区域;1894年,太平山地区暴发鼠疫,港英政府强化对华人社区的隔离,并确立了西医在香港的权威地位;^②港英当局将港岛中环和半山区等风景优越区域划为西人专属区域,1918年港英立法局通过《山顶居住条例》变相将山顶区域保留为西人居住区;一些高级医疗服

^①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p. 149.

^② 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75页。

务场所、俱乐部、会所(比如马会)、学校、教堂只对西人开放;在相同的岗位,英人公务员的薪酬待遇比华人高。^①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开始建构高级香港华人与其他香港华人的等级结构。港英政府一开始并非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建构“英国人——华人精英——其他香港华人”式的不同阶层等级偏见和歧视体系,而是在统治过程中,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逐步建立。比如,省港大罢工之后,港英政府开始调整统治策略,令具有一定协调能力的部分华人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体系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港英政治体制出现了著名学者金耀基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②的模式,即将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团体吸收到行政决策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港英政府和华人精英共治的局面。华人能够进入港英当局决策层,发挥咨询作用,自然意味着部分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但在英国的统治下,这部分华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达到港英当局的标准,比如他们必须接受西式教育,有熟练的英文水平,甚至变为英国臣民,效忠英皇。另外,由于所有的立法和诉讼程序都是英语,能够说英语的居民才能担任陪审员,从而将这些居民与大多数居民区分开来。^③

香港回归后,新政府对原来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改造。但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框架,港人的殖民创伤也以心理层面的“后殖民”的架构形式被保留下来。在英国其他殖民地,如伊拉姆·丹尼尔(Elam, J. Daniel)所说:“英国人可能会离开,但有很多当地领导人渴望取代他们的位置。被殖民地的领土可能会独立,但有许多民族主义者渴望盲目地复制欧洲灾难性的仇外形式:国界、文化同质性和防御性主权。”^④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构架下,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保持其长期以来的中西交融特色,并不存在对本国国民的“仇外形式”。但在香港与内地出现矛盾和冲突背景下,前殖民时期所保留的社会心理问题暴露出来,英帝国对当初的香港华人统治模式所造成的心理习惯,逐步演变为港人对内地人的偏见乃至仇视。部分港人强调香港文化优越于内地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也强于内地。而在西方的支持下,部分港人甘愿充当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等领域与中国对抗和渗透的急先锋。在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修例风波”中,尽管许多参与非法社会运动的青少年并未经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仍然接纳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殖民逻辑,甚至出现扭曲的“恋殖情结”。这说明香港“后殖民”认同的心理结构仍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显现出来。

三、香港“后殖民”认同心理结构与原因

(一)香港“后殖民”认同心理的基本结构

1. 文化偏见

文化偏见的社会心理结构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就逐步被建构起来。正如强世功论述的那样,英帝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统治香港的策略从军事和经济统治转向“文化”统治,即港督卢押所概括的“间接统治”。该统治方略的重点在于培养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国人”),“而要让华人

① 张俊义、刘志鹏:《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4页。

② 邢慕寰、金耀基:《香港之发展经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③ Tak-Wing Ngo,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2.

④ Elam, J. Daniel, “World Literature for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World Literature for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精英接受并认同英国文化或西方文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英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塑造为高等文明，而将中国文明贬低为劣等文明，将中华民族贬低为劣等民族或野蛮民族，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根本问题意识所在。”^①

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保留了文化偏见的社会心理结构，西方则基于自身利益通过控制香港媒体强化这种结构。香港激进本土势力和反对派鼓吹“文明等级论”，认为港人之所以比内地人更为文明，一方面是由于港人比内地人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认为香港受英国殖民，建立了优良的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公民意识强，公民素质高，甚至可以建构出“想象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则由于港人承接了中西文明之长，比如在文字方面，存在所谓的“繁体字为正统文字”的优越感，借此认为港人继承了华夏文化正统。香港激进本土势力和反对派的观点严重误导香港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于本国文化的认知。

2. 制度和意识形态偏见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影响和支持下，部分港媒也采取西方价值立场，对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曲解并横加指责，造成了香港民众对内地政治制度的片面认识和“刻板印象”。在香港回归前的十余年间，英国人大力推动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西方核心价值，比如通过人权法案、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及隐私专员公署法定机构。回归后，反对派长期以西方标准来看待“一国两制”。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反对派提出“一国”不能干预“两制”，特别行政区长官无须遵守“爱国标准”，即以美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标准推进香港政改。但实际上，资本主义民主并非全人类社会制度的最终归宿，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所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它们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在各种政治势力的竞争中出现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党结构。在此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性，因此世界政治文明也必然是多样的。在政党制度选择中，部分国家形成了非竞争性的一党制，部分国家则选择了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其优势在于不同政党可以体现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或阶级利益，但缺点也十分明显：政党往往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并受到私人资本的支配和操纵。当前，以美国体制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危机。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撕裂与对立加剧，这种状况在拜登政府时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不断对政治选举造成冲击；在南美洲，巴西也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泛滥以及治理危机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内生于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强调人民利益至上，将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政局和社会稳定，大政方针具有持续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让理论界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所在。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探索，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② 全过程民主理念的提出表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因此，在政治制度层面，并不存在西方压倒东方，占据绝对优势的问题，理论和实践都雄辩地证明“历史终结论”已经破产。中西制度存在差异性，但并不存在等级差别，更没有优劣之分。事实证明，“一国两制”作为香港独特制度优势，既能够不断发展和创新自身已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①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64—65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框架,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地位,也可以搭上国家经济快车,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但在西方势力以及香港反对派的认知偏见中,香港政治的变革方向必然是“西方政治体制”,而不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符合国情和港情的“一国两制”制度。在“仰望”西方政治制度,无法平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香港社会难以建构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3. 身份偏见

殖民统治造成阶层分化,还在此基础上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差异和偏见,以及“固化”的歧视观念。如霍米巴巴所说的那样,“固化”(fixity)——是殖民话语的重要特征。^①“固化”涵盖多个方面:香港本土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固化”香港特色中的中西方文化、历史和种族差异的杂糅,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体现为固化身份差异和偏见。不同群体对自身认可的前提在于,总有比自己更低的等级,进而从自身所处的等级中获得优越感。哪怕最低的等级也存在一个他们想象中更低的等级,也同样能够获得优越感。在激进本土主义的话语中,西方化的程度成为等级差异的唯一衡量标准,与本土内部不同的群体相比,不足够西方化的“他者”(内地人)则成为最低层次,可以令本土内的最低等级也高于外部的“他者”:内地人。香港回归后,在政治生态、教育文化、传媒领域,反对派和激进本土势力常常诱导民众导向歧视性的身份认同观念。比如在2016年的香港立法会宣誓过程中,“激进本土派”候任立法会议员,两位青年新政候任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故意将英文“China”读成极具侮辱性的“支那”。^②长期以来,在反对派和激进本土主义的煽动下,部分港人在现实和网络中用“支那”“蝗虫”来称呼内地人,严重贬低和侮辱中国人身份,是典型的身份偏见。

(二)香港“后殖民”认同心理结构不断延续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回归后,“后殖民”结构并没有因“一国两制”的实践而彻底改变,原因错综复杂。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在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反对派、激进本土主义的运作下,香港的教育体系,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社群长期建构和维系偏见的集体心理结构。

首先,教育体系认知偏见结构在回归前后左右了香港教育走向。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香港中英文教学比例为1:10,学校不设中国历史课,中国历史被编入亚洲史,港人国家民族观念被强行淡化;^③1992年,彭定康向香港大力推行西方民主价值,通识教育课程成为其推行该政策的工具。香港回归后,由于“去殖民化”不够彻底,国民教育遭到抵制。2012年,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任内试图在小学和中学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科,建立起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最终遭到所谓的“反国教运动”的抵制无疾而终。除此之外,香港通识教育问题严重,缺少大纲,教材无标准。教协长期以来借助其所编著的通识教材将不良观念意识引入校园。教材内容甚至还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占中”,负面解读内地存在的问题,或者直接丑化内地,用西方视角评判中国话题,得出负面结论。最后,中国历史教育问题严重。香港长期将中学中国历史无序加入通识教育中,导致港人缺乏对本国历史的认知。在中学文凭考试中,历史科试题甚至出现了美化日本侵华历史的状况,诱导学生得出日本侵华“利大于弊”的结论。

①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66.

② 《正确认识历史 尊重中国人身份》,大公网,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6/1019/3381674.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2月1日。

③ 汤华臻:《香港的教育问题花多少年都要解决》,中国网,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2_223961.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2月1日。

其次，错误的媒体和舆论引导不断加固后殖民认知偏见结构。一些黄丝港媒，比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不断塑造内地人“野蛮粗暴”的形象，妖魔化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经常预设反共立场，质疑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内地人。部分人在社交媒体和网络长期传播虚假信息，散播仇恨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和警察的言论。同时，西方媒体与香港黄媒、自媒体相互配合。西方媒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片面报道、误导观众，将香港暴力分子描述为“支持民主人士”，将非法活动表述为“和平示威游行”，将特区政府和警察维护香港法治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污蔑为“镇压”。如果说香港本土黄媒不断利用部分港人的后殖民偏见集体心理，直接制造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么西方媒体则充当教师爷，指手画脚，加筑后殖民结构，充当保护伞。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和媒体环境下，香港在文化教育层面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不断疏离。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转变为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堡垒和附庸，乃至反中工具，中国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在香港难以确立。

四、消除偏见与歧视：路径探析

2020 年香港国安法推出之后，香港“后殖民”认同心理结构有了被解构的契机，后殖民群体偏见认知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随着国家安全教育深入，香港学校课程加入了国家观念、国家身份认同、“一国两制”等方面的内容。《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在香港正式刊宪生效。这些具体做法都有利于港人突破“后殖民”认同心理框架。其次，香港推行了选举制度改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难以在香港扶植代理人，像以前一样对香港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彻底打破港人的意识形态偏见提供了国家安全保障。再次，在 2022 年初香港抗击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内地为香港的抗疫防疫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抗疫工作，港人对内地的制度优势、对西方的制度劣势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于消除文化、意识形态和身份认知偏见有重要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如何消除偏见，打破隐于社会深层次心理结构中的等级化的后殖民症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系化、普及化的民族国家论述，仍是建构港人国家认同不可绕开的课题。要转变这种认知偏见的社会心理结构，需要香港社会在接下来的教育改革中，注重对英国统治时期所留下的深层次社会心理问题加以清理，制定相应的教育文化、媒体和民生保障方案。

第一，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建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打破歧视性无意识偏见心理社会结构。在社会心理学看来，人们难以摆脱已经形成的偏见，但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各种偏见。媒体宣传可以起到提醒民众有意识减少偏见的作用。首先，需要借助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主流媒体力量(比如“文化央企”)，整合重构多种网络平台，包括文字平台、视频平台、音频平台。不仅要传统媒体(电影、电视、广播)加强升级改造和革新，同时也要重视对网络平台，包括移动媒体、互联网新媒体，户外新媒体(各类户外液晶屏幕载体，包括楼宇 LED、公交地铁高铁 LED、航空 LED)的投资和建设。借用多种平台，宣传反歧视、反偏见理念，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借助非主流媒体力量进行非偏见和非歧视宣传。在资讯发达的时代，社交网络媒体时刻为个体提供大量资讯。从社会心理结构层面来看，社交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的主要途径，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可以获得主流媒体之外的各类信息。这种渠道往往由于缺少监管，令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歧视性言论流行和传播。再次，需要在政府之外，鼓励反歧视、反诽谤、反虚假消息的

民间力量介入。在国际上,业已存在可借鉴的非政府组织,1913年成立的国际性犹太人非政府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长期致力于制止歧视、偏见和仇视,“最终目标”描述为“一个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遭受偏见、歧视或仇恨的世界”。专门的反诽谤非政府组织有助于民众在主流媒体和宣传之外,获得反假新闻、反歧视和偏见引导。

第二,教育是打破社会心理偏见与歧视的关键抓手。首先,坚定落实国民教育。香港回归以后去殖民化的不彻底和国民教育的缺失,让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缺乏基本国家认同,对“一国两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过分地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甚至将“一国”和“两制”割裂和对立。可以探讨如何结合青少年亚文化和生活实际,软性方式推进国民教育。其次,通过历史教育开展非歧视教育。在中国历史教育中,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反侵略战争是重要的国家历史教育内容。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史,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侵略者对华人存在着大量歧视史实,可以作为教育内容。通过教育专业和教师的引导,让青年学生认识各类歧视观念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认识支撑殖民主义者优越感的各种歧视做法。通过历史教育,让学生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建立起尊重他者、包容他者的精神,自主甄别歧视性、片面的言论。再次,加强香港本地历史研究,将香港历史与中国历史融合起来。通过香港地方志和相关史料的整理,以及《香港志》系列的出版和发行,宣传香港与国家之间的血肉一体关系,宣传香港爱国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事迹,推进香港历史与国家历史、香港文化与国家文化的一体化建设。最后,将讲好中国故事与国家认同教育结合起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国际化程度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引导客观、理性看待西方和中国发展情势的西方学者、媒体人客观分析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中国在诸多方面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更利于港人打破对国家和民族的偏见认知。

第三,着眼民生问题,探寻减少或消除歧视和偏见的路径。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看,歧视和偏见作为社会心理结构,属于上层建筑层面的内容,其根源在于经济和民生上的不平等。偏见和歧视可以被视作经济上不平等、不公平正义以及诸多矛盾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反映。从社会心理学的现实冲突理论来看,偏见和歧视也起源于现实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因此,一方面,应该积极帮助青年寻找出路,开辟就业渠道,打破阶级固化的状况,通过减少收入差距,逐步消除歧视和偏见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倡导平等意识,关心社会底层。总之要将民生问题的解决同非歧视、减少高低差别的身份意识结合起来。

第四,加强港人与内地居民之间的交流。研究表明,增进与别的群体成员之间的直接接触可以减少偏见^①。加强交流与沟通,是打破偏见的重要路径。尽管在2003年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开通,港人与内地人交流不断强化,两地开始走向融合,但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和偏见并未消失,在一系列非法街头运动出现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加强态势。但随着新冠疫情肆虐,香港与内地长期无法通关,交流受阻,部分港人深刻体会到香港与内地之间联系紧密,不可分割,这为疫情之后,增进两地相互理解,减少对群外的集体心理偏见,消除刻板印象提供了有利契机。

总之,香港的国家认同教育应该建立在去除歧视和偏见的基础上。如果偏见和歧视的社会心理结构无法消解,国家认同难以被建构起来。因为在这一歧视性心理结构下,中国文化、中国人身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国两制”实践,都因为与西方存在差异而不被认可。而打破偏见的关键路径,令港人认清偏见与歧视心理对香港社会的危害,勇于接纳并平等地看待不同群体成员,尊重不同于本地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明晓自身观念误区。

① [美]本杰明·B. 莱希著,吴庆麟译:《心理学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9页。

作者贡献度说明：杨晗旭，构思、分析文章结构、构建论文整体思路框架，撰写论文；常乐，完善整体思路和框架，修改论文。

Abstract

Postcolonial Cognitive Prejudice and Hong Kong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YANG Hanxu, CHANG Le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postcoloni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n social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value judgment enjoys great endurance. Befor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based on prejudice cognition in Hong Kong. Afte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Western forces and the long-term misleading of the opposition, Hong Kong has been alien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for Hong Kong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integrate into China's main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social psychology, Hong Kong society needs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 cul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protection, and break through the “postcolonial” psycho-symptomatic structure based on cultural prejudic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rejudice and identity prejudice at the level of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Key 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National identity; Prejudice

责任编辑 王景周
责任校对 邹雅嘉